

制度资本介入下农户生计资本的测度——以北京黄山店村为例

董敏杰¹ 杨犁² 甘春武¹ 潘雪³

1 烟台南山学院, 山东烟台龙口, 265713;

2 广州市技师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0;

3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1;

摘要: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解决乡村旅游生计双面效应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影响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意愿的关键因素。文章引入制度资本构建新的生计资本评价体系,以北京黄山店村为例,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对当地农户进行问卷调查与半结构性访谈,从自然、物质、金融、人力、社会和制度资本6个维度对其生计资本进行了测度,并论证了本地化情境下的制度安排到农户制度资本的转变。结果显示:1)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引入制度资本能够精准反映中国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真实结构;2)金融资本在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结构中具有特殊地位;3)物质资本在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关键词:乡村旅游;农户生计;制度资本;黄山店村

DOI: 10.64216/3080-1486.25.11.034

引言

贫困是全人类所面对的艰巨挑战之一,应对多因致贫仍存难题。20世纪90年代Chambers提出了可持续生计(SL)理论^[1],并发展成研究贫困的成熟工具;旅游业减贫潜力受广泛认可,随着中国乡村旅游到发展,其与农户生计、贫困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SL理论为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并深刻改变农户的生计资产与策略。

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SL框架是最受认可的^[2],框架以脆弱性环境和政策制度为背景,核心是自然、金融、物质、人力、社会五大生计资本,但该框架未必适配旅游场景,既可能简化乡村旅游生计分析,又忽视结构性障碍。在中国,政府对旅游发展作用关键,能显著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因此Shen等新增制度资本^[3],以适配旅游场景和中国本土情境,却鲜少有相关研究。

本文将制度资本纳入SL框架,可凸显其在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中的作用,明晰真实生计结构,丰富SL理论,为制定政府与农户内源性动力融合的长效减贫机制、改善农户生计提供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指标体系

制度是人类行动的持久规律,“制度资本”由Oliver于20世纪末在商业领域提出^[4],后延伸至多学科,学界依领域灵活界定其内涵。Shen等认为它是人们进入旅游

市场、分享利益及参与决策的机会,刘玲等视其制度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旅游经营并获收益的资本类型。

乡村旅游地制度资本主要有四种表征形式:地缘资本,农户对地域制度的熟悉度;政治资本,农户参与政治的形式;认知资本,农户对旅游发展趋势的把握;素养资本,农户内在修养^[5]。其中,地缘、政治、认知资本可通过农户参与旅游决策和投资的机会衡量,素养资本因与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重叠被剔除,而由农户获得利益分配的机会所代替。

此外,乡村旅游地农户其他生计资本的衡量指标如下:自然资本,耕地面积、质量及用于旅游的耕地面积;物质资本,房屋结构、家庭及旅游经营的固定资产与房屋面积;金融资本,家庭人均年收入、银行及亲友借款能力;人力资本,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数量、最高受教育程度、旅游相关技能拥有情况;社会资本,社会支持度、联结度、区位优势度、旅游培训及社会组织参与机会。

1.2 测度方法

熵值法是一种根据信息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具有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等赋权方法所不具备的客观性,因此文章采用该方法来确定各类生计资本指标的权重,出于篇幅考虑略去具体计算过程。最后计算出的农户生计资本总值应介于0~1之间,值越大,代表农户生计水平越高。

1.3 数据来源

黄山店村位于北京房山区，面积约 20.2km²，352 户人家。2008 年因防污染政策，农户从采矿转型探索绿色发展；2012 年“7.21”暴雨后，村委会推动搬迁并利用闲置资产发展民宿，老村向旅游村转型。如今已形成坡峰岭等景区及特色民宿群，2020 年民宿收入 2700 万元^①，获“全国文明村镇”等多项荣誉。

选取该村为案例，一是旅游发展历程完整，二手资料翔实可信；二是村委会地位较高，便于测度农户制度资本。调研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2025 年 1 月 18-20 日预调研，了解地理、旅游及民宿情况；2 月

15-28 日正式访谈，并按样本量表发放 21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84 份，有效率 87.6%。

2 农户生计资本测度结果分析

2.1 量化分析

将问卷数据整理后再进行相关计算，得出黄山店村被调查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权重及量化值（表 1）。通过最终加权计算可知黄山店村农户的生计资本总值为 0.34。按照理想化的生计资本指数值 1 为基准，表明该地农户赖以谋生的资源并不算丰裕，其生活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 1 黄山店村农户生计资本权重及量化值

生计资本	权重（%）	量化值	测量指标	权重（%）	量化值
自然资本（N）	19.61	0.23	耕地面积（N1）	30.47	0.20
			耕地质量（N2）	27.63	0.37
			用于发展旅游的耕地面积（N3）	41.90	0.16
物质资本（P）	34.65	0.31	房屋结构（P1）	5.09	0.87
			家庭固定资产（P2）	5.93	0.54
			旅游经营房屋面积（P3）	51.95	0.22
			旅游经营固定资产（P4）	37.03	0.32
金融资本（F）	6.14	0.57	家庭人均年收入（F1）	39.39	0.38
			贷款机会（F2）	48.59	0.65
			借款机会（F3）	12.02	0.89
人力资本（H）	9.39	0.42	人口规模（H1）	8.20	0.47
			劳动力数量（H2）	20.10	0.58
			最高受教育程度（H3）	6.88	0.65
			是否有成员具备旅游相关技能（H4）	64.83	0.34
社会资本（S）	16.45	0.35	社会支持度（S1）	8.19	0.46
			社会联结度（S2）	54.85	0.12
			区位优势度（S3）	14.80	0.63
			旅游技能培训机会（S4）	8.03	0.78
			参加社会组织情况（S5）	14.13	0.66
制度资本（I）	13.76	0.40	参与旅游决策的机会（I1）	74.59	0.28
			参与旅游投资的机会（I2）	19.22	0.72
			获得利益分配的机会（I3）	6.19	0.87

黄山店村农户 6 类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指数最高（0.57）。因旅游业发展，农户生计从采矿、务农转向打工、旅游业，叠加土地流转分红、农宅产业股等，收入显著增加，村集体年民宿收益 450 万元，入股村民年均分红超 2000 元；2017 年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 万元^②，接近房山区农村均值 2.3 万元。同时，地方产业扶持、旅游投资及熟人社会网络，降低农户贷款、借款难度，也助力了金融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指数 0.42，居第二。旅游业吸引少量劳动力返乡，多为中老年从事小规模民宿、土特产售卖等边缘旅游工作，高学历青年仍倾向外出。村委会重视旅游

技能培训，农户普遍具备基础经营能力，为后续发展奠基。

制度资本指数 0.4，排第三。因旅游规划、相关政策制定等重大事项不适合通过民主讨论敲定决策，故而这项指标的量化值较低；但村民均有旅游投资机会，可通过闲置房屋改造分红、土地流转获利、常规入股等参与；参与投资者享收益分配，村集体还为无力投资者提供补贴，利益分配机会指标达 0.87。

社会资本指数 0.35。农户多居公路旁、近坡峰岭景区，区位优势明显，村里常办旅游培训、设旅游合作社，相关指标值高；但社会支持度低（种类少、力度弱），

因搬迁割裂原有社会空间,且旅游产业未形成完善价值网络,普通农户社会联结度不足。

物质资本指数 0.31。农户住房、生活水平较好,无明显贫困。但多数农户将闲置房屋上交村集体,所有权转移后不计入旅游经营面积,私营民宿农户占比低,叠加相关指标权重较大,拉低整体指数。

自然资本指数 0.23。该村面积较小且多丘陵,自然资源本就匮乏,此前以采矿为主。2010 年矿业关停后,政府征收土地建旅游设施,生计转型使农户对自然资源依赖降低,土地荒芜且遭黄栌等物种侵占耕地转变为旅游景观,双重因素加剧自然资本流失。

2.2 重要性评价

根据权重计算结果可知,案例地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程度依次为: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制度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表1)。

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的重要性最高(34.65%),充足的生产资料是农户家庭资本积累关键,无房无地成为农户未参与旅游业的最大阻碍,这就反映出物质资本的重要性。

自然资本次之(19.61%),虽该村土地资源有限,但作为旅游资源基底不可或缺,耕地也为农户拓展生计提供底气。

社会资本排第三(16.45%),农户资本积累多依赖地缘、亲缘等社会资源,区位优势、旅游技能及良好社会关系助力从业与资本积累。

制度资本为 13.76%,农户资本积累取决于对制度环境认知及适应优化意愿,旅游投资、利益分配机会影响从业意愿,决策机会权重体现政策导向。

人力资本(9.39%)直接贡献率低,但具备旅游技能的农户能抓发展机遇;金融资本最低(6.14%),收入多被储蓄避险,借贷少,不直接支撑旅游生计。

3 结论

(1)在可持续生计框架引入制度资本,能精准反映中国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真实结构。传统 DFID 框架将制度结构视为“软件”背景,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中国政策制度靠人制定、依民意推动,应将制度要素作为“硬件”,凸显农户谋生主体地位,清晰呈现资本量化值,助力优化制度设计。

(2)金融资本在农户生计结构中地位特殊。案例中其量化值最大但权重最小,因乡土社会中,农户重视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潜在借贷机会,认为无需高度依赖金融资本,形成这一特殊状态。

(3)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加权量化值远超其他资本。房屋对国人有安身立命、慰藉心灵的意义,家庭固定资产体现财富地位,且乡村旅游发展推动旅游经营用房屋及固定资产占比上升,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将持续增强。

参考文献

- [1]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M].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K), 1992.
- [2]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M].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68-125.
- [3]SHEN F, HUGHEY K F D, Simmons D G. Connect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and to touris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15(1): 19-31.
- [4]OLINER C.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and resource-based view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9): 697-713.
- [5]周阳敏. 制度企业家、制度资本与制度变迁[J]. 社会科学战线, 2014 (1): 58-68.
- [6]刘玲,舒伯阳,马应心.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乡村旅游研究中的改进与应用[J]. 东岳论丛, 2019(12): 127-137.
- [7]席建超,张楠. 乡村旅游聚落农户生计模式演化研究——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案例实证[J]. 旅游学刊, 2016, 31(7): 65-75.
- [8]陈佳,张丽琼,杨新军,等.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J]. 地理研究, 2017, 36(9): 1709-1724.

注释

①数据来源:《2021 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

②数据来源:黄山店村实地调研访谈、《2021 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和《北京房山区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作者简介:董敏杰(1993-),男,汉族,甘肃秦安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区域旅游开发与管理方面的研究。